

2102

綦江文史資料

第九輯

政协四川省綦江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编



898

綦江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綦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一九八九年六月



綦江县文史资料
(第九辑)

政协四川省綦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四川省綦江政协 邮电编码631420)

印刷 綦江县印刷厂

封面题字

池永成

责任编辑

梅德华

篆 刻

赵平安

目 录

起义归国四十年.....	王心纯 (1)
军阀混战时期綦江的	
兵灾匪患.....	吴俊林 (24)
大革命时期的生活经历.....	潘觉民 (46)
霍栗如烈士事略.....	胡渊如 (61)
回忆高青地下党开展武装	
活动的情况.....	邹泽勋 (77)
隆盛解放目击记.....	吴鹏飞 (82)
郭扶乡公所两次被匪	
攻打的回忆.....	黄义乾 (84)
三角区征粮剿匪记.....	王积福 (93)
朱崇仁起义始末.....	张思九 (99)
回忆王宗德烈士.....	刘祥玉 (106)

綦江的反动会道门·····	吴鹏飞 (112)
川黔、川湘公路修建始末·····	邹泽勋 (126)
我所知道的张佐斌·····	陈希龄 (134)
民国时期綦江的电影概况·····	蔡克勋 (139)
民国时期綦江的川剧·····	蔡克勋 (144)
綦中断忆·····	程宏远 (149)

起义归国四十年

王 心 纯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已度过了七十四个头，从旧社会走到了新社会。回忆起旧社会的坎坷经历和归国四十年的光辉历程，以及目睹四十年来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心潮如涌，感慨万千。今承《綦江县文史资料》编辑组相约，撰写自叙传略，更是感动不已。我以《起义归国四十年》为题撰写此文，寄托我对祖国，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一、青年苦学

1913年，我出生在綦江北街信义长商号，父名友权，母梅氏，来自县太公山喻家沟。1922年我九岁时，上了綦江小学。1926年我哥哥王心海（后更名应嵩）带我到重庆东川中学初中部读书。

1927年，重庆发生了打击进步势力的“三·三一”惨案，我和哥哥从打枪坝会场缙城逃出。是时，东川中学业已关门，我们在恐怖的气氛中悄悄回家。

1928年，我考入重庆联合中学的初中，读了一年，因家里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我便在家赋闲。在赋闲的两年里，我刻苦自学，经常读书到深夜。我的伯父王菊轩是清末秀才，他有许多旧书，也有很多新书，这就给我一个自学的好机

会。我读了谢无量著的《中国大文学史》，梁启超著的《饮室文集》，还有《独秀文存》，《胡适文存》，以及胡适著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张慰慈著的《政治学大纲》等。读过的书我都作了笔记，也背诵了一些章节。我始终认为背诵是精读的最好方法。直至现在，青少年时背诵过的片段，至今犹能上口。

1929年夏，我又回到重庆联中读书，1931年在全区中学会考中，我得了全榜的第二名。那时许多学校的会考生，连一个及格的都没有。从此，县里的许多年青人都知道我了。

初中毕业后，我因家贫，无力升入普通中学，便考入了万县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由于我参加了一次驱逐“清共教师”的风潮，被勒令转学。我回到重庆，正值重庆大学招生，我便考入重庆大学中文系，后又转学外国文学系。1935年下学期，重庆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我便到川大外文系读书。次年秋，毕业于川大，取得了文学士的学位。

二、逃难噩梦

“毕业即失业，人嗤已亦嗤”。这是我当时所写五言诗中的句子，充分表达了我的心境。原来有人要介绍我到重庆海关工作，但我毕业时，此人突然病逝，等到我要寻饭碗时，已为时太晚，遂告失业。我住在哥哥王应嵩家里，每日读郑振铎编的《晚清文选》，知道近百年来有许多能人志士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出谋划策，甚至洒热血，抛头颅，不象现在有些人所说那样，中国人民是生性愚蠢，或是万马齐喑，没有一个人敢为国家的危难奉献

自己。

不久，南京行政院办了一个专科以上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可以登记失业学生，我便去登记了。登记的条件是操行好，论文分数高等等。我受审查及格后，因入班期间在年底，便先返故乡綦江三角镇。

三角小学，是我最关心的学校。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暑期寒假，经常在该校代课。由于我喜欢讲历史故事和国外地理知识，喜欢和学生一齐打球，学生都很喜欢我，尊称我为老师。那时该校教师只有四五位，学生不过几十人，气息奄奄，毫无起色。我回到该校上课，由学生串联，便又从乡间陆续来了几十位子弟。我办了个该校的首次运动会，大大增添了学校的生气，提高了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子女的信心。在此期间，我看见一些毕业学生每天在镇上打牌胡混，我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德行砺进会，成立了书报社，以提倡文化与体育为宗旨，请小学老师们轮流主讲。我还印发了多少份告乡中青年书，阐述了这一愿望。

在当年年底前，为了就业，我终于赴渝乘轮遥赴南京。在此之前，全国已喧腾西安事变，我到南京时，正值蒋介石被释归来，南京城内外鞭炮齐鸣，光焰照天，一派欢腾景象，共庆内战危机消逝，有利于抗御日寇。

我在就业训导班学习近一年，学习期满，于1937年春天，派进外交部，在总务司工作。这时日寇进逼，华北局势，日益紧张，战争气氛，越来越浓。芦沟桥事变后，我每天值夜班，一有急电，立即上报。八·一三之后，日机开始轰炸南京，我几次险被炸中。上海战区大场失陷前夕，国民政府已下令自宁迁渝，部中对我，发了一百元，勒令疏散。

当我到下关码头时，见行李堆集有似城墙，行人奔跑，争索小船渡江。幸好送我的那位族叔，以军人的身份强拉了一只小船，送我下了停在上游的巨轮。他刚下船，日机即来扫射，船在暮色中启航，我才经汉赴渝。当我踏上重庆朝天门的阶梯时，思绪萦怀，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噩梦。

三、初任教师

我回到家乡，伯父介绍我在綦江中学教语文，原先教语文的老师，本是川大讲师，他专攻考据学，也用考据这一套来教中学。我在一次改作文中，发现学生文理不通，这显然与学考据有关。我便将一些报纸文章摘出，教学生如何分析，如何表达。我自己作了“时文十弊”一文，把学生的见解，集中在一起，教他们再改，再领会。学生对此大感兴趣，作文质量，大有提高。我改授清代章学诚、梁启超的著作，力求文理通顺，辨理清晰。

不久，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来信，聘我任该校英文助教，我搭汽车赴渝，也有在南京送我上船的那位族叔同行。学生得知我要离去时，纷纷来车站送行。有的紧紧握手，潸然泪下，我也热泪盈眶。开车后，我族叔问我：“你对学生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大的吸引力？”我说：“你把学生当做子弟，他们就会把你当做父兄；教师对学生是真城的，热情的，学生对教师自然也是真城的，热情的”。在重庆大学任了两年助教，也在何鲁老师办的载英中学兼教英语课。在英语课中，我发现学生的英语学习基础不好，不肯在背诵上下功夫，因而读完就忘记了，以致理解不好。为此，我曾一口气背诵一篇长达四页的课文，以为示范，学生对此大为惊异！

193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五届全国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后，以荐任官任用，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我应考被录取。从五届考试起，国民党变更了考试办法，把考试及格作为初试，然后再到南泉受训，期满复试，才算是完全及格。受训将近一年，1940年，我被分配到重庆市政府工作。

四、转入仕途

我向重庆市府报到，被派在秘书处任科员。当时我的意愿是：定要清廉自守，克尽厥职，绝不逢迎上级，屈己求人。当时的市长为吴国桢，深为蒋介石所倚异；秘书长为吴泽湘，原任外交部驻川康外交特派员。此二人均系干练能员，我只能小心翼翼，勤慎工作。

1941年6月5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案。当时防空的管理，系市防护团负责。防护团员，都是市民自愿参加的。团的上司是市警察局，还有警察局的上级重庆市政府、防空司令部、卫戍司令部。在无数次的空袭中，防护团员不顾生死，舍己救人，可歌可泣的事证甚多。在空袭中，不少的小伙子常聚在防空洞口，等待敌机临头才溜进洞。有一次，恰巧一个防空洞口中了炸弹，市民躲避不及，死伤了数十人。防护团吸取了这一教训，才决定用木柱制成大门。门向内开，避免一哄而出。隧道中原也有通气装置，但因疲劳轰炸为时过长，挤在洞口的人越来越多，不能外出，遂造成这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我曾去较场口下的一个洞口观看。尸体横陈数百具，大多赤身裸体，莫辨面目，实惨不忍睹。事后我曾向当时影响大的大公报撰投一文，标题为《论行政上的责

任问题》，指责主管当局，平时互相争权，有过则互相推诿。我认为应该惩处上级官吏，不应责怪出生入死的防护团，尸体中已有不少是殉了职的团员，更不应该责怪他们。

我在重庆市政府任过科员、专员、秘书，在一位熟悉业务的参事指导下，我整理了重庆市已颁行的各种法规。在整理之前，我和主管的局科商讨问题，并到公会、工会底层机构访问，搜求民隐。这一工作，坚持的时间越久，对我的启迪也越大。我发现一些名为便民的条款，反而扰民，一些则徒具形式，毫不适用，后来都予以修改，重新颁布了十大巨册的《重庆市法规汇编》。此外，我还起草了市府的办事细则，并规定凡人民来访，必须在三日之内予以答复。力求简便，不事苛细。我还兼任市政会议记录、公报室主任，曾和当时的几位朋友商议，准备办一个市政期刊，但因都忙于工作，无力顾及。

1941年，我在储奇门住家，和几位綦江同乡常有来往。他们是吴举宜、文曙东、刘善思、陈翰屏等。这几个人很熟悉綦江情况，议论也多。我建议办个半月刊，取名《綦讯》。他们推举我当编辑，我应允了。当时我不知道办一个定期刊物之不易，虽是象现在的小报一页，但要定期写出，也会有不少困难，何况还有定稿、付印、校对等工作。在送校中，我多次遇到空袭，只能在街上屋檐下暂避。录印的人，也是一位同乡，他很出力，终得按期免费分送綦江县城和各个乡镇。这是綦江县第一次出现近似日报的刊物。办这个刊物的宗旨是一本大公，力求真实，伸张民意，揭发贪污。发表的文章，概不署名，实际上每期社论，都由我执

笔。《蓁讯》发行几期后，便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蓁江县里寄来了大量的稿件和消息，均须详办核正，这便增加了通信的数量和私人的接触。该刊办了一年，对蓁江是起了一定的影响。国民党的内政部看不顺眼，曾勒令登记，否则不许发行，我们未予理采。1942年底，我调到新疆工作，该刊无人负责，遂停。1943年，成都的蓁江同乡，办了另一个刊物《蓁蓉》，与《蓁讯》的作法相似。

五、天山风暴

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吴泽湘于1942年秋调任国民党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调我去充当特派员公署的主任秘书。当时我对苏联、新疆、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全不理解，便问市长吴国桢，吴介绍我去看梁寒操。梁为广东高要县才子，能书善写，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1942年春，他曾去过新疆，遍游天山南北。与他见面之后，他力主我前往。他认为我年青，应见多识广，但吴国桢不允。1943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吴国桢调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重庆市长一职，由贺耀组接任。

在新旧市长交接会上，吴向贺介绍了我，并说要调我回外交部，目前先去新疆。数日之内，吴与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商定，我即搭傅去莫斯科的专机去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

我到乌鲁木齐的次日，吴泽湘即与傅同机飞往莫斯科，去苏访问。临行时，吴对我只讲了两句话：“大事问外交部，急事问盛世才”过了几天，盛世才突然派了他的宋副官长来见我，要我急去西大楼主持一个招待会。我到会之后，

大吃一惊，原来那天要庆贺苏联的建军节，来宾都是苏联军官，约二三百人。其中有两位将官，还有上校、中校等。我心中疑虑，何来这样多的苏联军人？作了简单的祝酒词，陪同几位高级军官干了一杯后，我即首先告退。原来新疆是一个军阀互相残杀争夺政权的地方。民国初年以来，杨增新一直任新疆督军，后来为其外交部特派员樊耀南所谋杀。知情者金树仁又杀了樊耀南。1932年前后，哈密回族造反，金树仁出走，盛世才为金的参谋处长，手握兵权，在一个善后会上，盛枪毙了两名国民党官员，自任新疆“督办”。他上台后，实行所谓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实质上即亲苏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迫华北各省，他与苏联签订了各种密约，包括军事、政治、贸易、航空、地质、勘探各方面。根据这些密约，苏联边防第八团进驻哈密。表面上是防止日军西进，实质上是不让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盛与苏方还订了《苏新贸易条约》，以物易物，但苏方可以搭售卖不出去的商品。苏还在乌鲁木齐建立一个农具制造厂，实为飞机制造装配厂。此外，还成立了中苏航空公司，有班机航行于哈密与阿拉木图之间，一批苏方地质勘探专家走遍天山南北。由于盛伪装革命，中共曾派陈潭秋、毛泽民等赴新，帮助建设新疆。后来德军侵苏，采取了南进政策，盛认为苏军已无力反攻，于是变亲苏为亲国民党，大捕中国共产党人。蒋介石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赴新拉拢盛世才。朱与盛说合后，蒋介石允将政军大权交盛世才，盛交出外交权与国民党外交部，并撤销驻苏新边塔什干等五个领事馆，以示新疆属于中国的一个省。我在1942年年底去新时，国民党已派有少

数军队，进驻乌鲁木齐中央分校，任命黄如今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还任命了该省党部的委员。林继庸任建设厅长，稍后又派罗家伦任驻新疆的监察使。1943年苏军已逐步击退德军中路进攻，由于盛世才已经反苏，并给予苏驻新人员生活上各种困难，苏方即从新疆撤走其人力物力，支援前方战事。当时外交特派员公署的主要任务，是与苏方谈判苏方撤走后的各种交易，商定收购苏方驻哈密边防军营房的费用，讨论收购苏联飞机装配厂的厂房与设备。经多次谈判，仅是这一破旧厂房以四百万头羊作了交换。

盛世才在新，实行极端的独裁。他组织了一个特务集团，以警察处长李英奇为核心。他还搞了个亲族小集团把持省政。其中有他的妻子、兄弟、岳父、舅子、妹夫、联襟等。他学斯大林时期格克勃的那一套侦察、逮捕、栽脏、逼供等手段。据闻，当时乌鲁木齐共住有五万人，被捕入狱的，即有一万人之多，形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1943年秋，盛又突然逮捕了一批国民党派驻新疆人员，包括黄如今、林继庸省级人员在内，也逮捕了外交特派员公署苏联科科长。当逮捕这位科长时，我立即打电话问盛。盛说：“你不用管了，一切由我负责”。当夜我即发出急电，报告了外交部，重庆方面最早得到这一消息。次日晨，盛封锁电报，重庆与乌鲁木齐的信息，即告中断。

事实上乌鲁木齐与重庆间的信息，并未中断。盛报告蒋介石：一批国民党人与苏联勾结，共同谋反。蒋立即派朱绍良飞乌鲁木齐，与盛谈善后处理。结果，盛世才调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新疆省主席由吴忠信接任。在吴未到任前，省主席由朱绍良兼代。经过两个月的风波，才告平息。

后来据熟悉内情者谈：1943年盛见苏军在南线取得优势，而自己在新疆势力渐渐为国民党削弱，他又有意亲苏，曾派其联襟与苏方密谈。据称，苏方表示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如何。于是盛乃大捕国民党人作为亲苏的具体表现。但以后苏方仍无表态，于是盛只有下台，赴渝作闲官。

盛世才大捕国民党人时，吴泽湘不在乌鲁木齐，由我代理署务。我适患喉炎，不能下咽，坐卧不安，并非惧死，而苦于无法打开僵局。在此之前，据盛的一次报导，苏军突然集中在西郊的农具制造厂，有可能袭击乌鲁木齐的外交特派员公署。我当即与署内人员密商，深夜毁去重要文件，如苏军突然来到，我们都准备牺牲。而盛那次逮捕国民党人时，却未捕我，是因为需要我出面与苏联作官方周旋。万一盛又变卦，我随时均可入盛的监狱。

1943年春，在盛逮捕国民党人之前，我曾乘便搭驻苏联大使潘友新的专机赴阿拉木图。主要是护送外交邮袋，同时也去了解一下阿城一些侨民的申诉。我在阿城看见汽车司机多为女性，使我大为惊异，当时重庆尚无女性驾驶汽车。阿城里的工人，多是汉族肤色，起早睡晚，非常辛苦。想到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现象与苏联大后方公民辛勤工作的情况相比，成为鲜明的对照。我在阿城的一个大公园内，还看见清末一位伊犁将军铸造一口纪功的大铁钟，炫耀战功。但以后由于清廷腐败，帝俄出兵占领伊犁，大幅领土丧失。虽然曾纪泽交涉经年，仅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城周沃土，尽归帝俄所有。回忆历史的陈迹，使人感喟不已。

六、孟买侨务

1944年秋，我调任外交部专员，遂立即搭中苏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哈密，经河西走廊赴兰州转渝。过酒泉时，曾去玉门油矿拜访矿长孙越琦老先生。当时孙老以合作社方式管理该矿。矿内井井有条，工作人员安居乐业，生产石油，确保后方交通畅通。后来听说当时油矿的职工，都成为解放后开拓大庆和其他石油工业基地的骨干。

回渝后，我被分配到外交部情报司工作，编辑该司主办的刊物《政治生活》月刊。此时日军作垂死挣扎，妄想打通滇越通道，狼奔豕突，进至贵州独山，重庆为之震动。外交部职员，当时以能及早出国为幸。适印度孟买副领事出缺，代理部务吴国侦派我前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山城鞭炮之声，通宵达旦。在陪都人民欢乐的气氛中，我携内人及长子乘机飞印度加尔各答转赴孟买任所。

在孟买的领事馆，一共四人。我到任后，领事馆将所有侨务，全部交我掌管，只海员工作除外。我即着手调查一下侨民情况，写了一篇《孟买华侨概况》报部。我当时还不知道外交部的积习，有“报喜不报忧”的说法。凡印度报上所载不利于中国的消息，我都剪贴上报。我还兼任孟买华侨中学校长，我虽然不懂广东话，但也能和学生交谈，深感愉快。

当时孟买为远东赴欧洲要道，许多要人来去均由此经过。如1946年国民党派员赴英接受重庆号巡洋舰，来去均在此地小住。西藏要人去南京，也都绕道孟买再乘飞机或轮船至沪。

一次一位领事馆同事告诉我，现海员在领事馆存款较